

傳統的再編與歷史的連續性——戰後初期的農民曆

文·圖片提供／游舒婷（神奈川大學歷史民俗資料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民國 35 年題名「光復臺灣大陰陽曆」、副標「臺灣民曆」的農民曆。（李孟哲提供）

影，並回顧日治時期臺灣民曆相關歷史，藉此一窺戰前戰後歷史的連續性。

蔡錦堂的研究已指出，做為宗教政策的一環，臺灣總督府自1913年起刊行臺灣民曆，以別於當時日本的官方版曆書「神宮曆」。臺灣民曆除記載日本帝國的節日、紀元法等象徵天皇的時間表象外，最大特色是在舊慣溫存的名目下，記載了中華式傳統曆書中可見到的行事吉凶宜忌。日本民間使用的曆書原本也多印有來自中華文化的吉凶日，但是在文明開化的名目下，神宮曆中已不復見任何行事宜忌。然而，臺灣民曆的編輯雖說要溫存舊慣，實際上捨去了行事忌（凶）日，也不見各式吉凶神的名

農民曆被視為中華文化的貯藏庫，目前研究中尚未有人指出其與日治時期刊行過的官方曆書「臺灣民曆」的關聯。本文提供幾本戰後初期農民曆書影，

稱與陰陽五行等原理。

負責編纂臺灣民曆的日本學務官藤田捨次郎，在1915年刊行的《臺灣教育》裡發表一篇名〈曆的故事〉（「曆の物語」）。文中指出，雖然在文明開化的今天，在臺灣民曆上還記載行事吉凶宜忌不免令人有些訝異，但是臺灣民曆與從中國流傳進來的通書比較，乃是顯得「實用」、「便利」、「繁簡適切」多了。從藤田捨次郎的說明來看，筆者認為臺灣民曆的編輯一方面以「繁簡適切」之名對中華宇宙觀的整體性進行了傳統的再編，另一方面又將含有中華元素的臺灣民曆視為文明落後的表徵，以區別臺灣與日本的文明發展。對於臺灣



▲民國 42 年以「臺灣民曆」為題名的農民曆。（左圖孫國全提供、右圖郭双富提供）

民曆這樣的編排特色，1930年11月21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則記事形容其是「中華曆與日本曆的折衷」。

自刊行臺灣民曆以來，臺灣總督府透過基層行政組織推廣該曆。從《臺灣日日新報》的幾則報導中得知，當時欲購買該曆可以向公所的社會課申請，或可透過區總代、町委員、保正來購買。另外，1916年的《臺灣時報》記載了坊間書局也可以買到臺灣民曆。但是從臺灣民曆的發行人來看，1922年時約只有13%的家庭有《臺灣民曆》，普及成果不佳。推估原因是一般家庭流通的年曆是以「春牛圖」為主流。1937年後，做為戰時體制的一環，臺灣總督府為促進日本和臺灣的一體感，不但廢止日臺之間原有的一小時時差，臺灣民曆裡原有的行事宜忌記載也全部取消。戰時下，臺灣總督府停止推廣臺灣民曆，改以推廣神宮曆，然而臺灣民曆仍持續刊行至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

筆者曾拜見過一本由臺南崇文書局所刊行的1946年的曆書，封面題名為「光復臺灣大陰陽曆」，題名下又寫了「臺灣民曆」四字。其內頁雖然在節日欄中日本帝國的節日改成中國國慶的紀念日，但每一日的欄位下段卻像戰時的臺灣民曆，沒有任何行事吉凶宜忌記載，且和臺灣民曆一樣記有「種植」、「漁撈」一欄。

回溯日治時期歷年的臺灣民曆可發現，1920年開始有「種植」與「漁

撈」的欄位，配合不同的節氣記載當季適宜種植的蔬果和可捕到的漁獲，推測與當時州廳農會的資源統制政策相關，而此一欄位在戰後的農民曆中被延續下來。另外，筆者訪問過一位在臺南刊行農民曆的出版社，負責人孫先生表示他父親是戰後臺灣最早開始刊行農民曆的出版社之一，當年他父親拿著記載有行事宜忌的農民曆到區公所推銷，開啟了刊行農民曆的風氣。

就筆者見過的農民曆為限，戰後初期可見到類似日治時期臺灣民曆的封面樣式，到60年代之後，印有神仙或壽桃等中華風吉祥圖案的封面漸成為主流，而日欄下段的每日行事宜忌等吉凶記載也有逐年增多趨勢。

另外，戰後初期可見到以「臺灣民曆」為名的曆書，在中國化政策下被「中國民曆」或「中華民國曆」一名取代，而60年代後期「民曆」此一名稱也漸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至今慣用的「農民曆」一名。☞



▲民國 50 年、54 年以「臺灣民曆」為題名的農民曆。